

要为“没条件的单位”创造条件

以“大周末”促进旅游消费，不能给群众办事带来不便，更不能以挫伤公众对社会公平的信心为代价。相比之下，如何给那些没条件给员工多放假的用人单位创造“条件”，此时显得更为迫切。



评论员观察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总共四千余字，以促进旅游消费为主题，引发最多关注的却是那句“有条件的单位可优化调整夏季作息，让职工将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度假”。

从中不难看出，公众对放假问题是高度关注的，这里面既有对休息休假权的重视，也反映了对于休假现状的普遍焦虑。尤其考虑到目前国内劳动者的实际情况，相当一部分人连法定的休假权尚且无法充分享受，假若“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再锦上添花般多了“周五下午”，很可能让无法“弹性

作息”的劳动者感到更多的不公平。

事实上，眼下劳动者的休假情况本就参差不齐。像议论比较多的带薪休假，按照人社部的调查数据，全国落实率仅约50%，达不到这个平均数的多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而在法定假日里，用人单位以“值班”为由侵占劳动者休假权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从以往媒体或专业机构所做的调查来看，上述侵权的现象在企业中较为多见，管理制度相对规范的外企执行情况较好，而经营压力较大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最为严重。

于是，休假问题不仅关乎法定权利能否履行，更关系到劳动者对社会公平的感受。职场社交平台领英所做的《2015年中国职场新常态》调查报告就显示，20.8%的80后、90后劳动者，更在乎是否加班而非薪酬，不愿以牺牲个人健康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利益。因此，尽管市场经济

已深入人心，创业创新成为国家战略，但相当多的年轻人仍在努力成为能够“正常上下班”的公务员。这或许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一些地方针对党政机关的“强制带薪休假”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

考虑到有可能引发的社会影响，如何推行弹性作息，如何给“有条件”把握好尺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弹性作息在欧美一些国家超过40%的大公司早已采用，中国一些大城市的部分用人单位也给了员工分批次上下班的选择权。实行弹性作息，一来要求对个体工作进行精确考核，时间有弹性但工作量是没有弹性的，弹性是个人加班加点“挤”出来的；二来要保证与其他岗位顺利对接，也就是说不因为个人弹性休假耽误别人的事。

这也就意味着，简简单单的“有条件”，对用人单位的管理水平和用

人安排提出的要求非常高，而且也未必适合所有的岗位。像一些政府部门的窗口单位，就不能以弹性作息为由缩短服务时间，给群众办事造成阻碍。而同样值得担忧的是，一些并不具备多少实际职能的清闲岗位，比如那些被纪委通报或媒体报道的“上班打牌玩游戏、在编不在岗”的“重灾区”，很有可能成为弹性作息的最大受益者，甚至以此掩盖人浮于事的现实。要知道，越是存在人浮于事的单位，越容易满足增加假期的条件。

所以说，鼓励弹性休假是好事，但关键是要把好事办好，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还得重视有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应。以“大周末”促进旅游消费，不能给群众办事带来不便，更不能以挫伤公众对社会公平的信心为代价。相比之下，如何给那些没条件给员工多放假的用人单位创造“条件”，此时显得更为迫切。

□公民论坛

管理网络音乐不该只有“黑名单”

□张春羊

文化部发布了近期排查内容违规文化产品的结果，共有120首网络音乐产品被列入黑名单，并被要求集中下架。“拉黑”歌曲的原因涉及淫秽、暴力、色情内容，根据相关规定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提供，否则将依法查处。(8月11日《新京报》)

根据报道，被“拉黑”的120首网络音乐产品含有宣扬淫秽、暴力、教唆犯罪或者危害社会公德的内容，违反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因此被列入网络音乐管理黑名单。而在该规定中，对于网络音乐作品的监管方式，只是依赖于“拉黑”

手段，并没有其他更加细化和严厉的措施。同时，即便采取了“拉黑”方式，也只是注重于事后的补救，相关音乐作品已经在网络广泛传播。

显然，面对网络音乐鱼龙混杂的局面，仅仅依赖于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的查处，压力不可小觑。基于此，就应该完善法律法规，构建法律层面的监管体系，将事后补救变为事前预防。比如，网络音乐作品应该提高准入门槛，强化网络平台以及音乐制作主体的责任，细化和完善惩处机制。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堵住网络音乐作品的监管真空，让涉及淫秽、暴力、色情内容的网络音乐无处遁形。

“分数线之争”凸显招考职责错乱

□吴江

据澎湃新闻8月11日报道，清华大学公布江西理科录取分是685分，而江西考试院说清华录取分是686分，两者互不相让，导致一位正好考了685分的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高考理科状元王希“濒临”落榜，至今没有结果。

按理来说，作为大学录取的分数线，本该是唯一的，这一分数线的确定，也应当遵循明确的规则。具体而言，既然招生的主体是大学，在分数线如何定这件事儿上，当然应由大学说了算，考试院作为高校录取信息的执行与信息公开机构，则理应守好自身角色与职责，不应在具体分数线的制定上过多插足才对。

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分数线制定流程，本该是大学根据考生报考与分数分布情况，确定本校的录取分数线，然后由考试院发布并进行后续的投档录取工作。然而，现实的情形却是，考试院与其他行政机构类似也有着扩权的冲动。于是，本该由大学说了算，却被考试院越俎代庖。录取分数线成了大学招生权与考试院权力争夺的对象，不过是权力不清、角色模糊、职责混乱的招录流程的必然结果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与考试院的分数线之争，亟待厘清其中原委，唯有明确各方角色与职责，招录过程透明公正了，“神仙打架，考生遭殃”的闹剧才不会重演。

□一语中的

征税是一种拔鹅毛的艺术，把鹅毛拔下来，又不让鹅叫唤。

中国政法大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改编了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的一句话，从税收心理学的角度，说明课税要考虑纳税人的反应和税痛感。在他看来，税痛感归根到底要看课税是否跟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相匹配，税负如果重，相应的公共服务就应该更好。

就像谈恋爱，没有人愿意和只会自说自话的人交往。

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汪冰看来，大班制的课堂需要有纪律，如果是为了让老师省事，从而违背了孩子的天性，就不是好的纪律。过度强调纪律，往往是为了满足单向传递，时间久了，学生的思

维会有惰性。而在教育领域，参与性的记忆是最牢固的。

中国毕竟中低收入者多，他们会觉得钱更不值钱了，这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所以这种讨论不了了之了。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主任郭田勇称，有关方面针对是否发行大额人民币确实有过讨论，如果引发通胀预期，人们的消费行为和理财观念就会发生变化，容易造成经济混乱。而且如今金融技术和支付手段日趋多样化，大额现金交易越来越少。

■本报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以教育均衡根治“幼升小”排队

大家谈

□熊丙奇

又到小学入学时，据媒体报道，我国一些地方，为孩子上学报名，家长提前一两天就在部分小学门口，用马扎“安营扎寨”，排起长队。通常而言，这也是择校的一种，在中小城市尤为常见。因为按照教育部的部署，到2015年，19个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在未实现严格学区划分的地方，择校就会以排队报名的形式出现。

客观而言，我国各地都已经解决了学生能上学(至少能保障所有户籍人口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而各地存在的择校热是因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条件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可谓“质量择校”。治理“质量择校”，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增加教育投入，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提高薄弱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条件，缩小校际差异。如果90%的公办教育资源做到均衡，还会有多少人会择校，还有多少家长去排队报名？

但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在这方面的作用并不多，而是花更多精力在抓限制学生择校、禁止学校测试上，这是治理择校热逻辑的颠倒。治理结果可想而知，很难治理出均衡的局面，反而增加择校的焦虑。大家所见的是，推进就近免试入学，催生出“学区房”，禁止学校笔试、面试，招生转入地下，政府一再号召家长不要盲目择校，不要去排队报名，告诉家长排队没有用，不是对口学区、学校无法报名，对口学校、学区都能

报上名，但报上名后要通过摇号或者测试(面试)来决定录取，可心急的家长只有去排队才心安。

有效治理择校热，需要推进教育改革。首先，应建立学区教育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由学区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本学区的教育发展战略，由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部门拨款，如此，将彻底改变由政府部门说了算的拨款方式。而在政绩导向下，有的地方政府并不愿意加大教育投入，而且存在锦标主义拨款思维，制造了地区内部教育发展的不均衡。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还满足于给学生基本的入学保障，而不是想办法提高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均衡。就是在生源减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没顺势推进小班教学，以此提高办学质量，而是撤并学校、减少教育投入。结果是当地的优质教育资源一直有限，而老百姓的择校需求，也就十分旺盛。

其次，应推进管办评分离，政府部门只负责投入和依法监管学校依法办学，不得干涉学校的办学事务。由政府出资举办的公办学校，政府部门可以要求其招生范围，但也不适宜干涉其招生过程；而对于民间资金举办的民办学校，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政府部门是不能干涉学校的招生的。政府部门只有尊重学校的自主办学权，才能让每所学校办出特色，而不是千校一面。概而言之，就是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公办追求高质量均衡，而民办给学生提供差异化选择，如此，整个义务教育才会有健康的生态，家长才不会受困于“幼升小”、“小升初”，备受择校折磨。(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媒体观点

老年环卫工如何老有所依

最近，陕西西安某街道办将23名超过65岁的环卫工人集体辞退，收入中断保险不足，生计顿显艰难。

对老龄环卫工来说，这是个沉重的话题。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却出于生计所迫，拾起了年轻人不愿去做的体力活，这在环卫等行业正越来越普遍，更为现实的问题在于，高龄劳动者的比重和人数还在与年俱增。2014年全国50岁以上的农民工接近4700万人，他们大多在一些急难险苦的岗位上工作，也面临着西安环卫工一样的尴尬处境。

老年人拥有就业意愿，并不是什么需要加以阻止的“坏事”。高素质、高技能老年人才有助于缓解就业结构失衡问题，文化程度不高、缺乏专业技能的老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同样也可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如果用更积极的眼光看，这也

是延长社会人口红利、抑制老龄化社会弊端的途径之一。对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如何给忙碌在工作岗位上的老年人更多制度关怀和保护，怎样保障老龄劳动者的权益，才是当前最为迫切的课题。

既然苦累差的环卫工如此难招到人，可不可以待遇、福利上更加倾斜，提高职业吸引力？既然高龄农民工已成庞大群体，能不能探索完善针对高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模式？既然现实中老龄劳动者的权益难以保护，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能否加大力度为他们维权？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征程上，政府部门不仅不能是一个坐在路旁晒太阳的旁观者，而且必须成为拥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还必须是一个想到就落实、说到就做到的实干家。(摘自《人民日报》，作者李达仁)